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
·
柳宗元
诗文集

(下)

李 雯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····· | 员 |
| 铭杂题····· | 员 |
| 井铭并序····· | 员 |
| 舜禹之事····· | 猿 |
| 谤谣誉····· | 苑 |
| 鞭谣贾····· | 圆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一····· | 员 |
| 题谣序····· | 员 |
| 杨评事文集后序····· | 员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二····· | 员 |
| 序····· | 员 |
| 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····· | 员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三····· | 员 |
| 序谣别····· | 员 |
| 送薛存义之任序····· | 员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四····· | 员 |
| 序····· | 员 |
|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····· | 员 |
| 愚溪诗序····· | 员 |
| 序谣棋····· | 员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五····· | 猿 |
| 序····· | 猿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| 獮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六 | 獮 |
| 记官署 | 獮 |
| 全义县复北门记 | 獮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七 | 獮 |
| 记亭池 | 獮 |
|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| 獮 |
| 零陵三亭记 | 獮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八 | 灏 |
| 记祠庙 | 灏 |
| 零陵郡复乳穴记 | 灏 |
|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| 灏 |
|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| 灏 |
|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| 灏 |
| 永州铁炉步志 | 缘 |
| 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九 | 缘 |
| 记山水 | 缘 |
| 游黄溪记 | 缘 |
| 始得西山宴游记 | 缘 |
| 钴姆潭记 | 缘 |
| 钴姆潭西小丘记 | 远 |
|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| 远 |
| 袁家渴记 | 远 |
| 石渠记 | 远 |
| 石涧记 | 远 |
| 小石城山记 | 苑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| 苑 |
|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 | 缘 |
| 书明谤责躬 | 缘 |
| 与杨京兆凭书 | 缘 |
|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一 | 愿 |
| 书 | 愿 |
| 与吕道州论《非国语》书 | 愿 |
| 答吴武陵论《非国语》书 | 愿 |
|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| 怨 |
| 与友人论为文书 | 怨 |
|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二 | 愿 |
| 书 | 愿 |
|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| 愿 |
|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| 源 |
| 柳宗元文集卷三十四 | 苑 |
| 书 | 苑 |
|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| 苑 |
|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| 猿 |
| 柳宗元文集卷四十四 | 远 |
| 非《国语》上 | 远 |
| 不摇藉 | 远 |
| 三川震 | 愿 |
| 大摇钱 | 园 |
| 无摇射 | 员 |
| 问摇战 | 猿 |
| 骨节专车摇□矢 | 缘 |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|---|
| 卜 | 员 | 范 |
| 柳宗元文集卷四十五 | 员 | 愿 |
| 非《国语》下 | 员 | 愿 |
| 命摇官 | 员 | 愿 |
| 戮摇仆 | 员 | 怨 |
| 叔鱼生 | 员 | 园 |
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

铭杂题

井铭并序

始州之人，各以罍瓢负江水，莫克井饮。崖岸峻厚，旱则水益远，人陟降大艰。雨多，涂则滑而颠。恒为咨嗟。怨惑讹言，终不能就。元和十一年三月朔，命为井城北隍上。未晦，果。寒（食）冽而多泉，邑人以灌。其土坚埴，其利悠久。其相者，浮图谈康、诸军事牙将米景。凿者蒋晏。凡用罚布六千三百，役庸三十六，大砖千七百，其深八寻有二尺。铭曰

盈以其神，其来不穷，惠我后之人，噫！畴肯似于政，其来日新。

【译文】

原先，柳州的百姓都用一种大肚小口的瓦罐去背江水，喝不上井水。江岸险峻高大，天旱时江水就离岸更远，背水的人上下来往非常艰苦。雨多的时候，道路太滑容易摔倒，人们经常为此发愁。他们既抱怨取水的困难却又迷惑于妖言邪说，始终没有打成水井。元和十一年三月初一，命令在北面的城壕上打井。不到一个月，水井打成。井水喝起清凉爽口，而且水源很足，城里人都到这里来取水。井壁土质坚实，它带给人们的好处一定会很长久。勘测井位的人有和尚谈康、州衙门中管理各种军务的副将米景，主持凿井的匠人叫蒋晏。打这口井，共用去罚来的钱币六千三百，雇用打井

工三十六人，用大砖一千七百块。井深六丈六尺。铭文说：

井水充足是由于自然界的奇妙作用，它的来源无穷无尽，造福后代子孙。唉，如果有人能把这种精神推广于施政，未来的气象就会月异日新。

舜禹之事

魏公子丕，由其父得汉禅。还自南郊，谓其人曰：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由丕以来皆笑之。

柳先生曰：丕之言若是可也。向者丕若曰：“舜、禹之道，吾知之矣”，丕罪也。其事则信。吾见笑者之不知言，未见丕之可笑者也。

凡易姓授位，公与私，仁与强，其道不同；而前者忘，后者系，其事同。使以尧之圣，一日得舜而与之天下，能乎？吾见小争于朝，大争于野，其为乱，尧无以已之。何也？尧未忘于人，舜未系于人也。尧之得于舜也以圣，舜之得于尧也以圣，两圣独得于天下之上，奈愚人何？其立于朝者放齐犹曰“朱启明”，而况在野者乎？尧知其道不可，退而自忘；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，进而自系。舜举十六族，去四凶族，使天下咸得其人；命二十二人，兴五教，立礼刑，使天下咸得其理；合时月，正历数，齐律、度、量、权衡，使天下咸得其用。积十余年，人曰：“明我者舜也，齐我者舜也，资我者舜也。”天下之在位者，皆舜之人也。而尧隳然，聋其聪，昏其明，愚其圣。人曰：“往之所谓尧者果乌在哉？”或曰“耄矣”，曰“匿矣”，又十余年，其思而问者加少矣。至于尧死，天下曰：“久矣，舜之君我也。”夫然后能揖让受终于文祖。舜之与禹也亦然。禹旁行天下，功系于人者多，而自忘也晚。益之自系亦犹是也，而启贤闻于人，故不能。夫其始系于人也厚，则其忘之也迟。不然，反是。

汉之失德久矣，其不系而忘也甚矣。宦、董、袁、陶之

贼生人盈矣。丕之父攘祸以立强，积三十余年，天下之主，曹氏而已，无汉之思也。丕嗣而禅，天下得之以为晚，何以异夫舜、禹之事耶？然则汉非能自忘也，其事自忘也；曹氏非能自系也，其事自系也。公与私，仁与强，其道不同，其忘而系者无以异也。尧、舜之忘，不使如汉，不能授舜、禹；舜、禹之系，不使如曹氏，不能受之尧、舜。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，故曰：笑其言者非也。

问者曰：“尧崩，天下若丧考妣，四海遏密八音三载。子之言忘若甚然，是可不可欤？”曰：是舜归德于尧，史尊尧之德之辞者也。尧之老更一世矣，德乎尧者，益已死矣，其幼而存者，尧不使之思也。不若是，不能与人天下。

【译文】

魏公子曹丕凭借他父亲曹操打下的基础得到汉朝的禅让。他从南郊祭天回来，对他的群臣说：“舜禹接受禅让那种事，我现在完全了解了。”从曹丕以来人们都讥笑他这句话。

我柳先生说：曹丕这样说是可以的。当时曹丕如果说：“舜禹禅让的道理，我已经懂得了。”这是曹丕的大错误。然而他讲的是事势，那是符合实际的。我只看到讥笑者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，看不出曹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。

凡是在改朝换代的情况下禅让帝位，是处以公心还是出于私意，是凭借道德还是依靠强力，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；但前代的帝王已被人们遗忘了，继承的君主已为人们所拥护，这种事势是相同的。即使像尧那样圣明，得到舜以后立即就把天下交给他，行吗？我可以预见那样就会发生动乱，小则在朝廷上引起激烈的争议，大则在民间发生斗争，

那样造成的混乱局面，尧也没有办法收拾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尧还没有得到人们遗忘，舜还没有被人们拥护。尧信任舜是因为尧圣明，舜得到尧的信任是为舜圣明，只有圣明的人在天下人了解他们之前互相了解，对那些不了解他们的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要说那些老百姓，就是那个在朝做官放齐尚且不了解舜的圣明而竟说：“丹朱开明。”更何况那些在民间的人呢？尧知道那样的办法不行，就退居幕后让人们慢慢忘掉他；舜知道尧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忘掉他而拥护舜，于是舜就进一步去主动争取人民对自己的拥护。舜选拔了十六个氏族首领，除掉了四个凶恶的氏族首领，使天下人都得到有才能的首领；他任命了二十二个大臣，提倡五种道德规范，制定礼制刑法，使天下都得到很好的治理；正确划分四时月份，整理历法，统一乐律和度、量、权衡，使天下人都能正确地使用这些。经过十多年后，人们都说：“开导我的是舜，治理我的是舜，帮助我的是舜。”天下那些做官的，都是舜任用的人。然而尧衰老了，耳朵聋了，眼睛模糊了，头脑也不清楚了。人们说：“从前所说的那个尧究竟在那里？”有的人说：“他老了。”也有人说：“隐居起来了。”又过了十多年，那些思念尧而问起他的人更加少了。及至尧逝世时，天下的人说：“舜当我们的君主已经很久了。”在这样情况下，才能在尧的祖庙里接受禅让，继承尧最终放弃了的帝位。舜后来把帝位禅让给禹，也是这样的情况。禹治水走遍天下，他的功迹为人们怀念得很多，而他退居幕后很迟。伯益也迟迟没有在人们中间树立威望，取得拥护，而启的贤能却又为人们所闻知，所以禹最后没有能够把帝位禅让给伯益。君主当初功绩大对人们的影响深，那么人们忘记他

就迟。不然的话，人们就会很快忘记他。

汉朝的政治腐败已经很久了，它不受拥护而被人们遗忘的情势十分严重。宦官、董卓、袁氏兄弟、陶谦等人残害百姓，罪大恶极。曹丕的父亲曹操平息祸乱，建立强大的势力，经过了三十多年，天下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曹姓的人了，人们已经不再思念汉朝。曹丕继承曹操而受汉献帝的禅让，天下的人感到得到他为君已经晚了，这跟舜禹禅让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？然而汉朝的帝位并不能像尧舜那样自愿让人们忘记，而是他们所做的事不得人心才被人们忘记的；曹氏父子也不能像舜禹那样使人们拥护自己，而是他们建立的功绩获得了人们的拥护。虽然其中或从公心出发，或由私心出发，或者凭借仁德，或者依仗强力，舜禹禅让和汉魏禅让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，但他们中间一方被遗忘，一方受拥护，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尧和舜如果不像汉末帝王一样被人们遗忘，就不可能把帝王传授给舜和禹；舜和禹如果不像曹氏父子一样受人们拥护，就不可能从尧和舜那里接受帝位。但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只是窥测他的思想动机就讥笑他。所以我说：讥笑他的话的人是不对的。

有人问：“尧去世时，天下的人好像死了父母一样，全国三年不奏乐。你说人们忘记了他，似乎说得过分了，这可不可以这样说呢？”我回答说：这是舜有意把功德归之于尧，以及史书上尊崇尧的德行的说法。尧衰老退居幕后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，那些对尧感恩戴德的人，越来越多地去世了。其中当时年幼而还活着的人，尧有意设法不让他们思念自己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尧就无法把天下禅让给别人。

谤谣誉

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，亦各有道。君子在下位则多谤，在上位则多誉；小人在下位则多谤，在上位则多誉。何也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，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，得其宜则誉至，不得其宜则谤亦至。此其凡也。然而君子遭乱世，不得已而在于上位，则道必拂于君，而利必及于人，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，故可杀可辱，而人犹誉之。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，则道必合于君，而害必及于人，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，故可宠可富，而人犹谤之。君子之誉，非所谓誉也，其善显焉尔，小人之谤，非所谓谤也，其不善彰焉尔。然则在下而多谤者，岂尽愚而狡也哉？在上而多誉者，岂尽仁而智也哉？其谤且誉者，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？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，出一庸人之口，则群而邮之，且置于远迹，莫不以为信也。岂惟不能褒贬而已，则又蔽于好恶，夺于利害，吾又何从而得之耶？孔子曰：“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善人者之难见也，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。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，传之记者，叔孙武叔，时之贵显者也。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，是以在下而必困也。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，功利及于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，向之谤之者，今从而誉之矣。是以在上而必彰也。

或曰：“然则闻谤誉于上者，反而求之，可乎？”曰：“是恶可，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！”

其所自善人也，则信之；不善人也，则勿信之矣。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，则已耳。如有谤誉乎人者，吾必征其所自，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。其有及乎我者，未敢以

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。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，吾又安取惧焉？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，吾又安取荣焉？知我者之善不善，非吾果能明之也，要必自善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凡是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毁谤或赞扬，各有不同的原因。君子处在下位时受到诽谤多，处在上位时受到赞扬多；小人处在下位时受到赞扬多，处在上位时受到指责多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君子适合在上位而不适合在下位，小人适合在下位而不适合在上位。一个人所处的地位适宜，赞扬就来了；所处的地位不适宜，毁谤也就来了。这是通常的情况。但是，君子如果不幸遇到乱世，又不得已处在上位，那么他的政治主张一定会与君主发生矛盾，然而人们一定会从他的主张中得到利益。因此，对他的诽谤就只会流行于上层，而不会影响到下面，所以他可能被杀戮，可能受屈辱，然而下面的人还是称赞他。小人却要遇到乱世，然后才能够爬到上位，那么他的政治主张一定会迎合君主，然而人民就一定会从中受害。因此，对他的称赞就只会流行于上层，而不会达到下面，所以他会受到宠爱，能够获得富贵，但是下面的人还是要指责他。对君子的称赞，其实并不能叫称赞，只不过是如实地显示了他的美德而已；对小人的指责，其实并不能叫指责，只不过是把他的罪恶揭露出来罢了。这样说来，那些处在下位而受到很多指责的人，难道都是愚蠢和狡猾的人吗？处在上位而受到很多赞扬的人，难道都是有道德和才智的人吗？那些指责或称赞别人的人，难道都是明白道理又善于掌握褒贬的标准吗？可惜社会上一些人听到某种称赞或指责就分不清是非，本来出自某个庸人之口，大家就不分是非

纷纷传播，并且传到远近四方，没有人不信以为真。岂只是褒贬不当而已，他们还被自己的好恶所蒙蔽，根据自己的利害去判断，我们又从哪里去了解一个人好坏的真实情况呢？孔子说：“不如他家乡的好人称赞他，家乡的坏人憎恶他。”好人是难得见到的，那么岂不是诽谤君子的人就不少，诽谤孔子的人也不少。《论语》上记载着的叔孙武叔，是当时的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人，他就指责过孔子。至于那些没有记下来的人，还有不少。因此，君子在下位时，处境一定很困难。等到他遇到好时机，得到君主的信任，处在一般人之上，他的政绩就能遍于天下，天下人都喜欢他拥护他，以前诽谤他的人，现在也跟着赞扬他了。所以君子处在上位，他的名声就一定会显扬。

有人问：“那么听到来自上面的指责或称赞，就回过头来从自身找原因，可以吗？”我说：这怎么可以呢？不过也应考察这些指责或称赞来自什么人吧！那些出自好人之口的，我就相信它；出自坏人之口的，我不相信它。如果我分不清这是好人还是坏人，那就算了。如果有人被指责或称赞，我一定考察那指责或称赞的话出自什么地方，不能因为那种话多就全部深信不疑。那种指责或赞扬如果有涉及到我的，我也不会因为那种话多而感到荣耀或惧怕。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，骂我是盗跖，我又怎么会感到害怕呢？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，赞我像仲尼，我又怎么会感到荣耀呢？那些熟悉我的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也不是我一定了解清楚的，总之，我一定使自己的思想行为尽量正确罢了。摇摇摇摇

咸摇宜

兴王之臣，多起污贱，人曰“幸也”；亡王之臣，多死寇盗，人曰“祸也”。余咸宜之。

当两汉氏之始，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，无他焉，彼固公侯卿相器也。遭时之非是以讦，独其始之不幸，非遭高、光而以为幸也。汉、晋之末，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间以死，无他焉，彼固劫戮困饿器也。遭时之非是以出，独其始之幸，非遭卓、曜而为祸也。

彼困于错乱，伏志气，屈身体，以下奴虏，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，一得适其僚，其进晚尔，而人犹幸之。彼伸于昏乱，抗志气，肆身体，以傲豪杰，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，一得适其僚，其死后耳，而人犹祸之。悲夫！余是以咸宜之。

【译文】

开国之君的臣子大多出身低贱，有人说：“这是他们幸运。”亡国之君的臣子大多死于贼寇，有人说：“这是他们遭了祸殃。”我认为这两种历史现象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当西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王朝的初期，屠户、商贩甚至服劳役的犯人和奴隶出来当上了公侯卿相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本来就是当公侯卿相的人才。他们遇上了政治昏乱的时代，因而不得志、受压抑，这只是起初的不幸，并不是遇到高祖刘邦、光武帝刘秀才交上了好运的。东汉和西晋末年，公侯卿相遭劫持、被杀戮、受困挨饿，躲藏在断垣残壁之间死去，也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本来就是该遭

劫持、被杀戮、受困挨饿的材料。他们遇上了政治昏乱的时代因而得以官高位显，这只是他们起初的侥幸，并不是遇到董卓、刘曜才遭到祸殃的。

那些人在政治昏乱的年代遭受困厄，志气不得伸展，委屈己身，为奴为虏，平定战乱造福社会的高才大德不能施之于人民，一旦得到适合施展才能实现平生志向的时机，他们的被进用已经是太晚了，可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交了好运。另外那些人则是在政治昏乱的年代得以出人头地，趾高气扬，为所欲为，傲视豪杰之士，残害人民、制造祸乱的伎俩到处得逞，一旦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，他们已经是死的太迟了，可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遇到了祸殃，这真是可悲啊！因此，我认为前面说的两种历史现象都是理说当然的。

鞭摇贾

市之鬻鞭者，人问之，其贾宜五十，必曰五万。复之以五十，则伏而笑；以五百，则小怒，五千，则大怒；必以五万而后可。有富者子，适市买鞭，出五万，持以夸余。视其首，则拳蹙而不遂；视其握，则蹇仄而不植：其行水者，一去一来不相承：其节朽墨而无文，掐之灭爪，而不得其所穷；举之翩然若挥虚焉。余曰：“子何取于是而不爱五万？”曰：“吾爱其黄而泽。且贾者云。”余乃招僮爇汤以濯之。则邀然枯，苍然白，向之黄者梘也，泽者蜡也。富者不悦。然犹持之三年。后出东郊，争道长乐坂扳下，马相踏，因大击，鞭折而为五六。马踏不已，坠于地，伤焉，视其内则空空然，其理若粪壤，无所赖者。

今之梘其貌，蜡其言，以求贾技于朝，当其分则善。一误而过其分，则喜；当其分，则反怒，曰：“余曷不至于公卿？”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。居无事，虽过三年不害。当其有事，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，以夫空空之内，粪壤之理，而责其大击之效，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？

【译文】

市场上有一个卖马鞭的，有人问他多少钱一根，本来鞭子的价钱只值五十，他一定回答要五万。还价给五十，他就弯腰大笑；给五百就小怒；给五千，就大怒；一定要给五万他才卖。有一个富家子弟，到市场上用五万钱买了一条鞭子，拿来向我夸耀。看看那个鞭梢，却是卷缩着不舒展。看看那个握柄，也凹凸不平，歪斜不直。那行水的地方，一去一来不相承接。它的节疤腐朽墨黑而没有纹路，用手指甲掐